

戴元光 主编

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 2013 蓝皮书

中国新闻理论研究

中国传播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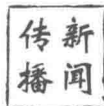
中国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

广播电视研究

中国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戴元光 主编

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 蓝皮书 / (2013)

主笔 郝一民 孙 藜 姚 涵 孙 健 於红梅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从“新闻理论研究”、“传播学研究”、“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广播电视研究”、“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五个版块对 2013 年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研究角度宏观,论述问题详尽,基本还原了年度学术界研究的基本面貌。可作为从事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研究参考用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蓝皮书. 2013 / 戴元光主编.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313-12293-3

I. ①中… II. ①戴… III. ①新闻学—传播学—研究—
中国—2013 IV. ①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4686 号

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蓝皮书(2013)

主 编: 戴元光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出 版 人: 韩建民

印 制: 常熟市梅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字 数: 237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12293-3/G

定 价: 50.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11.25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12-52661481

这两年一直在考虑每年出一本记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书,2012年就组织几位青年学人做了梳理,但横竖看了不满意,停留在电脑里。2013年又请了几位,花了三四个月,也理出来了,将就出版。万事开头难,今后会继续,希望越做越好。

我认为,这几年新闻传播学研究,有成绩,有不足,总体讲,没有生气,甚至在退步。这和当前欧美传播学研究也处于低潮相似。

新闻学研究方面,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新闻专业主义、新闻基本概念及理论本土化等是本年度研究的热点话题。大数据时代,新闻媒体借力融合,产生了完全有别于传统的新型媒体形态和发展态势,特别是新闻媒介借助大数据技术与受众的接轨。因此,在媒体融合时代,世界新闻学研究一方面面临几乎同样的问题,向媒体的发展,新闻媒体面对新媒体发展的冲击,传统的新闻价值面临重构,新闻传播方法面临巨大的变化,新闻突发事件暴发频繁,新闻媒体白热化的竞争。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围绕新闻理论基本问题的讨论仍在不同层面表现,分歧未变。传播学研究,正如书中所述,2013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者的反思意识、问题意识和学术研究的自主性有所提升,但尚未构成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自觉;2013年的传播研究延续着近年来知识版图的拓展,但是融贯理论与经验,特别是立足于中国本土传播实践的高质量研究依然尚不多见;新媒体在2013年继续成为传播研究理论反思的语境和经验研究的重要对象,但研究论域尚较为分散,要想形成有一定凝聚力并且有较大生产空间和前景的研究论域尚需时日。新媒体的研究可分为几大类:对国外研究的介绍和国内外文献的综述;采用未来学路径的憧憬(如对“大数据”时代的揣测);运用思辨的方法展开的理论分析(如对“新媒体事件”、二级传播的再思考);采取一定方法搜集并分析经验观察的经验研究(如对于媒体微博、微信平台的分析、关于新媒体如何重构新闻业和阅听人等);对媒介生产和运作的经验总结和业务批评;电子媒体如广播、电视等在新媒体大数据面前,渐显颓势。广播电视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广播电视史、广播电视理论以及广播电视业务、较少或未涉及广播电视经营、广播电视管理及广播电视法规研究领域。这些变化,学术界极为关注。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传媒产业发展趋势研究:主要从大数据时代的传媒、报业、广播电视、新媒体、出版业五个方面对传媒产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新闻传播体制、规制研究:以“署局合并”为重点,分析了“大部制”改革背景下的传媒管理体制的变革;这一年学者们对于中国传媒法制体系的建构也进行了积极的研讨;此外,对于

西方国家的传媒规制、网络实名制的探讨也是 2013 年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文化产业研究,主要涉及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文化产业制度、文化产业园、区域文化产业等问题;广告经营管理研究,从广告产业,广告法律法规等视角对我国广告的经营与管理进行了研究。

目 录

2013 年中国新闻理论研究	(001)
----------------	-------

2013 年中国传播学研究	(028)
---------------	-------

2013 年中国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	(058)
--------------------	-------

2013 年广播电视研究	(097)
--------------	-------

2013 年中国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	(142)
-------------------	-------

2013 年中国新闻理论研究

本部分对我国 9 种新闻传播学 CSSCI 期刊及 60 余种新闻理论研究专著进行了定量描述与定性分析,总结了 2013 年新闻学理论研究的热点与特征。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新闻专业主义、新闻基本概念及理论本土化等是本年度研究的热点话题,我国的新闻理论研究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重心转向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理论的发展与革新。

2013 年,中国新媒体的移动化和融合化程度不断加强,新闻传播机制仍然处于探寻变革的轨道中,作为理论支持与指导的新闻学理论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发现 2013 年我国新闻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情况,我们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具有代表性的新闻理论 CSSCI 期刊及相关理论专著进行了搜集整理,以发现新闻理论研究的基本格局、主要话题及基本特征,并分析新闻理论研究的问题及发展趋势,简要提出关于未来研究的一些想法。

一、研究对象与基本数据

研究主要选取《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当代传播》、《新闻与写作》、《新闻记者》、《新闻界》、《传媒》等多种 CSSCI 期刊及同年出版的新闻理论著作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搜集了 2013 年上述期刊中有关新闻理论研究论文及同年出版的新闻理论专著,共得到论文 380 余篇,专著 60 余部。根据新闻理论研究侧重点的不同,我们对研究内容做了分类,主要划分为: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新闻专业主义、新媒体下新闻理论、新闻媒体人、新闻基本概念、新闻理论本土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理论研究现状、新闻法律法规等九个主要研究领域,以描述新闻理论研究的基本格局。

在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分类中,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研究最多,占总研究对象总数的 21.8%,主要以社会责任、人道主义关怀为武器。针对我国当前新闻工作领域职业失范现象进行分析、批判并建构。事实上,新闻道德规范问题的研究也是以往新闻理论研究的热点话题。但在 2013 年的研究热潮与我国连续被曝光的新闻记者及网络大 V 违规发布消息有直接关系。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研究有了鲜活的现实案例,同时也是对自身生活、工作环境的重新认识与规约。在数量上,屈居第二位的是新闻专业主义研究,占研究对象的 17.6%,主要

倡导尊重新闻生命、客观报道的新闻职业标准,是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借鉴与中国化发展。新媒体下新闻理论研究占研究对象的15.3%,主要强调新媒介环境下新闻理论的革新与发展,以实现传统新闻理论的当下转型。新闻基本概念研究占研究对象总数的11.4%,其中既有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新闻概念的重新界定、梳理,也有对消费主义语境之下新闻概念的厘清,凸显时代变迁给新闻带来的内涵与外延的变化。新闻理论本土化的研究占研究样本9.5%,位居第五位,强调在全球化、市场化的背景下,建构具有中国主体性新闻核心理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占研究对象总数的7.4%,主要强调我国新闻事业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并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大众传媒时代发挥指导作用;新闻理论研究现状综述占研究对象总数的6.8%,主要是对往年新闻理论研究状况的综合与分析。新闻法律法规研究占5.8%,强调坚持新闻自由和法律独立;新闻媒体人研究占研究对象的4.4%,主要强调媒体人/新闻人/记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及其对新闻活动的影响。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关新闻史的研究。在习惯的概念中,新闻史一直被排除在新闻理论范畴之外,但通过对2013年新闻史的搜集与爬梳,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相关论点为新闻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因此,在文中给予一定的关注和分析。为突显新闻理论研究领域分布情况,表现期刊与专著关注点的差异,本研究将对期刊与专著分别论之。

二、新闻学术期刊研究的新视野及热点话题

1. 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研究

新闻职业道德规范一直是新闻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特别是2013年度接踵而至的媒体事件,对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研究尤为突出。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既包括新闻服务于公众的伦理,也包括新闻工作者所要遵从的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也包括职业制度的建构。以研究范围为划分依据,2013年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研究可分为对国内、国外新闻职业道德研究。

对国外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研究,主要表现在国外新闻发展现状与职业道德关系的介绍与分析上。如陈力丹、崔绍轩的《瑞典传媒监督的法律与职业道德保障》一文,“从瑞典对传媒监督的法律保障、传媒与瑞典政府的关系、瑞典新闻从业者的新闻角色认知等方面,分析了瑞典传媒履行监督职责的良好外部环境。同时也指出,看似完善的保障性因素,并不必然使瑞典的传媒监督呈现十分完美的状态。瑞典传媒同样存在其他各国传媒都存在的共同问题:自身利益的追求与履行传媒监督职责的平衡。”^①拓展了国内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视野,也为国内探寻新闻业“利益”与“职责”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对象。

对国内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研究。对国内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研究,首先表现为意识形

^① 陈力丹、崔绍轩:《瑞典传媒监督的法律与职业道德保障》,《新闻界》,2013年第6期。

态指导下“服务公众”的新闻伦理研究,也就是说,新闻一定在服从国家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当诸多价值发生冲突时,市场价值与新闻时效价值要让位于“公益”。杨保军、雒有谋在《新闻学视野中的公共利益》中明确指出,“公共利益是职业新闻最大的存在理由和终极的道德应该。”而且,分别从三个层面指出新闻学视野中的公共利益属性:“新闻产品(内容本质上而言,主要指事实信息和意见信息)的选择和组织以公共利益为基本指向;新闻媒介作为公共领域而存在,并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参与权与表达权;新闻业是保障社会基本善的道德支柱性行业,应将自由、民主、正义、公平、公正等人类共享的重大价值奉为圭臬”^①。

其次,从新闻业的社会影响力角度,探讨新闻报道的社会意义,其潜在的意义在于坚持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如祁梦竹的《浅论新闻伦理对于打造媒体公信力的意义》,指出“在当今的新闻传播活动中,虚假新闻、有偿新闻、片面性报道等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严重影响了媒体的公信力,其主要原因在于新闻道德失范。”此文“认为建立正确的新闻伦理尤为重要,关键在于以真实性为基本原则,并尊重人的权利。通过新闻工作者道德建设、健全新闻传播机构的管理体制、确立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等途径,进一步完善新闻伦理体系,进而更好地发挥新闻媒体的社会功用,实现新闻传播活动本身的社会价值。”^②此文指出新闻失范的现状,并尝试做出建设性解决途径,具有指导价值。

更多的研究是对新闻失范具体现象的分析,通过案例分析法揭示潜在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如范以锦的《职业精神与新闻道德、社会公德孰重孰轻——剖析韩国 KSB 电视台直播自杀事件》,从记者的职业精神出发,指出“作为记者,坚持专业精神与新闻道德、社会公德必须同时兼顾”,而且,“在准确和时效发生冲突时,宁可牺牲速度也要保证真实、准确”,“当紧急情况下需要服务于社会公益时,即便有价值的新闻也要让位。”^③又如王悦、范以锦的《新闻媒体的“天职”与“不可为”——评析从汶川到芦山 5 年间中国媒体的地震报道》,指出“围绕新闻媒体赶赴前线报道灾情是‘天职’还是‘添乱’的争论,具有深远的价值和意义。深入一线现场尽快呈现事实真相是记者的使命,报道诸如地震之类的灾难事件更是新闻工作者应尽之职,然而如何在灾难报道中既履行‘天职’,又规避‘不可为’之事,则是需要新闻媒体思考和把握好的问题。”文中明确指出新闻工作者可为“志愿者”、“监督者”、“临时指挥者”,但不可为“煽动情绪者”、“新闻炮制者”、“新闻主角”,这是对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规范的细化,具有指导实践的意义^④。也有学者通过对“4.20”芦山地震新闻报道的分析,指出“媒体工作者肩负着社会利益和媒体利益的双重责任,既要恪守在现场传递真相的责任,也要承担不对新闻当事人造成伤害的责任。”^⑤也就是职业精神与人性道德关系的阐释。也有学者从“人本主义”对具体事件的深入分析,如陈力丹、廖金英的《救灾新闻须以人为本抚慰

① 杨保军、雒有谋:《新闻学视野中的公共利益》,《新闻记者》,2013 年第 3 期。

② 祁梦竹:《浅论新闻伦理对于打造媒体公信力的意义》,《传媒》,2013 年第 5 期。

③ 范以锦:《职业精神与新闻道德、社会公德孰重孰轻——剖析韩国 KSB 电视台直播自杀事件》,《新闻与写作》,2013 年第 9 期。

④ 王悦、范以锦:《新闻媒体的“天职”与“不可为”——评析从汶川到芦山 5 年间中国媒体的地震报道》,《新闻与写作》,2013 年第 6 期。

⑤ 唐金龙:《我眼中的媒体责任》,《新闻与写作》,2013 年第 6 期。

民心——以浙江余姚水灾报道为分析对象》，指出救灾宣传不能背离“人不理念”，“务必顾及群众的感受”^①。

对新闻道德规范研究最具历史性、宏观性和指导性的论文要算王贺新的《新闻伦理、职业道德与规范研究的知识地图——对1979年到2011年新闻传播类四大期刊相关文献的计量分析》，此文“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入手划定新闻伦理、职业道德与规范研究领域的范围，以1979到2011年新闻传播类四大期刊为检索范围，对研究话题的分布和变迁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已有研究主要探讨的是意识形态问题，研究话题的数量变迁整体呈锯齿状不稳定形态。时段上以1989年为界，分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至2011年两个时段。两个时段研究的主要话题一致，但有增长方式和增长点的差异。90年代以后的平缓增长显示了研究者群体的努力，也印证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逻辑。文章提出中国新闻改革是‘观念引入’和‘边缘突破’并行的观点。但没有制度的突破，中国媒体‘宽松带’的状态难以改变。”也就是说，此文通过对“新闻伦理”、“职业道德与规范”历年研究趋势及内涵概念变化的梳理，旨在发现中国新闻改革的一般规律，并提出我国新闻改革未来的方法路径，也借此暗示了新闻职业道德与规范的发展程度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巨大影响^②。再有郭淑娟的《社会性媒体中的新闻伦理反思》也从发展、革新“新闻伦理”的角度指出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路径，文中指出“新闻伦理在社会性媒体中的生存条件发生了极大变化，网络媒体的产业属性突出、新闻传播方式趋于多样化、信息互动性显著增强、参与传播信息的队伍多元化、网络言论情绪化等，对一直适用于传统媒体的新闻伦理来说，这样的环境是复杂的，应当从新闻伦理主体的变化入手，结合社会性媒体的特征，在继续践行追求真实、客观、公正、恪守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基础上，完善新闻伦理在社会性媒体中的不足与缺陷。”^③但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对新闻道德、新闻规范、新闻伦理的内涵进行学理的分析，而被统一认定为相同的新闻道德规范范畴。

2. 新闻专业主义研究

近年来，新闻专业主义受重视程度逐渐增加。2013年延续了此研究热点的话语体系，并表现出发展与开拓的姿态。面对新媒体的飞速发展与新闻报道鱼龙混杂的生态环境，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呼唤带有时代的必然性。此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闻专业主义内涵分析和指导意义研究；一方面是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指导理论，解决具体问题。

前者主要研究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现实处境，以及中国当下新闻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必然性选择。有学者从中国新闻生态环境、时代特点、社会价值等角度，做出具有宏观洞见性、现实指导性和中国本土性特征的学理分析，如杨保军的《当代中国主导新闻观念的可能

① 陈力丹、廖金英：《救灾新闻须以人为本抚慰民心——以浙江余姚水灾报道为分析对象》，《新闻记者》，2013年第11期。

② 王贺新：《新闻伦理、职业道德与规范研究的知识地图——对1979年到2011年新闻传播类四大期刊相关文献的计量分析》，《新闻大学》，2013年第1期。

③ 郭淑娟：《社会性媒体中的新闻伦理反思》，《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13期。

选择：发展新闻专业主义》指出“明晰主导性新闻观念、确立明确的‘新闻主义’是时代的要求。”并认为“建立在‘发展新闻主义’与‘专业新闻主义’统一基础上的‘发展新闻专业主义’，是当代中国主导新闻观念的可能选择。在观念论视野中，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就是以新闻专业主义观念实现新闻业自身健康发展、促进社会整体发展、促成新闻领域与其他社会领域良性互动发展的‘新闻主义’。”^①论文明确指出“新闻专业主义”的时代性，也针对中国社会特点和新闻专业主义自身力量特点进行了整体阐释，指出新闻专业主义中国本土化的要求及研究方向，具有理论的开拓性意义。也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为出发点，指出当下中国新闻的发展方向，如陈力丹的《从形式主义到新闻专业主义——关于媒体落实“八项规定”的观察与思考》，根据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内容，指出“反形式主义，折射的是执政理念与价值观念”，“形式主义不仅是一些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它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了一种普遍现象，这其中也包括新闻传播领域。”因此，“传媒的形式主义不改革，没有出路。”因此，中国新闻要“回归新闻专业主义，用新闻话语替代宣传话语。”并指出，“落实‘八项规定’应从中央媒体做起。”^②

也有学者对中国不良新闻现象根源的探析，如胡翼青、汪睿的《新闻专业主义批判：一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指出，“学界从没有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达成过共识，但诸多表述都倾向于将其形容为新闻从业者的一种价值追求。然而从普利策再到新闻的客观性运动，新闻史提供了另一种看问题的视角。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究其历史成因，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美国科学管理思想渗透到社会各行各业息息相关。因此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人们永远需要专业的新闻，但不一定需要资本主义的新闻企业。”^③此论文指出，在众多新闻现象中，不良新闻现象的产生基本源自对新闻专业主义内涵的疏离，在理论上厘清了中国新闻实践的困惑与诸多不良新闻现象的根源。

基于此，有学者对新媒体环境下是否需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进行解析。如吴飞的《新媒体革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命？》一文，“通过梳理西方公民新闻运动的概念、模式，以及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分析认为，自媒体环境下，社交网络的发达，不但不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终结者，而且会是更有力的维护者，只要人类对新闻需求的目标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要我们还希望通过新闻这种方式来探测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新闻专业主义仍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与实践纲领。”^④当然，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与作用发挥也受到新媒体与公民新闻的挑战。胡翼青的《自媒体力量的想象：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一文，“将新旧媒体竞合讨论的维度区分为技术层面与新闻专业主义层面，又将新闻专业主义层面的讨论区分为专业意

① 杨保军：《当代中国主导新闻观念的可能选择：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3期。

② 陈力丹、毛湛文：《从形式主义到新闻专业主义——关于媒体落实“八项规定”的观察与思考》，《新闻记者》，2013年第2期。

③ 胡翼青、汪睿：《新闻专业主义批判：一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现代传播》，2013年第10期。

④ 吴飞：《新媒体革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命？——公民新闻运动与专业新闻人的责任》，《新闻记者》，2013年第3期。

识形态维度与社会角色维度。通过经验事实层面的证伪,得出技术和专业意识形态的挑战都是诱因,而中国新闻业受到公民新闻挑战的现象只是行业结构性和制度性缺陷的折射。新旧媒体竞合关系之辩,不是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专业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仍然是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是新闻业社会角色的重新调整,我们需要被新制度重塑的行动者。”^①

除了上述新闻专业主义理论的建构研究外,也有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出发,对新媒体语境下具体现象的分析,并发出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的呼声。如薛国林、彭雪蕾的《深度报道为何没有深度——从新闻专业主义看当前深度报道的不良倾向》指出,“深度报道逐渐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报道方式,介于新闻调查和新闻评论之间并具有独立的叙事方式。然而,在媒介融合大背景下,在新传播技术和复杂环境的双重影响下,深度报道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具有严重主观倾向的刻意策划、模式固化的报道结构以及过于文学化的叙事方式。”作者指出,这些新闻现象的出现都需要新闻专业主义解决,做到报道客观、观点鲜明^②。又如,谢静在《从专业主义视角看记者微博规范争议——兼谈如何重建新闻人与媒体组织间的平衡》中,指出“有关记者微博问题的讨论,涉及个人与组织间的关系,且多以公私二元对立为解决途径。”但是,这种简单的分法过于武断,“不应采取简单的公私两分法,也不能将职业与职务混为一谈,而要回到新闻专业主义本身。从职业社会理论来看,专业主义概念确实与公共相关,但跨越了个人与组织层面,其核心是从业者的工作自主权。”针对微博规范争议中的一些模糊观念,此文“首先系统地梳理了新闻专业主义有关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微博等新媒体将对新闻专业主义产生的影响,以及由于中西微博功能不同,新闻工作者应当依据新闻主义原则规范微博行,并指出微博时代新闻专业主义职能的变迁^③。

也有对新媒体语境下缺乏新闻专业主义媒体案例的分析。如吴世文的《争议性事件中的公众书写与新闻专业主义实践——以“邓玉娇事件”为例的考察》,指出“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争议性事件中膨胀的公众书写和新闻专业主义实践及其相互关系,是值得探究的重要议题。”因此,此文“将‘邓玉娇事件’作为案例,运用框架建构和话语实践的理论视角研究发现:公众书写在事件发展的各个阶段,都热衷于使用道德评价框架,以提供观点为主,价值框架突出,道德话语实践倾向明显;报纸在事件爆发期和蔓延期,主要采取事实认定框架和事件解决框架,运用推演事实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框架视角,追问事件发生的社会原因,呼吁进行社会改革,偏向‘公众一方’,而在事件解决期则偏向‘政府一方’,和政府有关部门保持一致。公众书写和专业媒体报道呼吁、重申和强调社会价值观,是达至社会共识和重新整合社会的重要过程。公众书写创造的‘业余主义书写范式’存在促动和发展‘专业主义书写范

① 胡翼青:《自媒体力量的想象: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新闻记者》,2013年第3期。

② 薛国林、彭雪蕾:《深度报道为何没有深度——从新闻专业主义看当前深度报道的不良倾向》,《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8期。

③ 谢静:《从专业主义视角看记者微博规范争议——兼谈如何重建新闻人与媒体组织间的平衡》,《新闻记者》,2013年第3期。

式’的可能,需要不断推动公众理性参与事件,促使专业媒体平衡报道事件”^①。再如,王瑞林的《从医患门报道看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现实尴尬》一文,“重点以‘八毛门’等医患门报道为分析案例,对中国当下的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现状进行适度考察,并对中国新闻专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失背后的原因进行反思和总结。”再如董天策的《专业操守与理性精神不可或缺——从“习总打的”假新闻谈起》一文,指出“‘习总打的’是2014年4月轰动一时的假新闻。从刊出后迅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与普遍称赞,到新华网核实为假消息及《大公报》发布致歉声明,都发生在4月18日一天之内。随即,‘习总打的’究竟是真是假让人感到疑惑,引起种种猜测,网络舆论沸沸扬扬,莫衷一是。”^②这是相当典型的缺乏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案例,需要从专业角度加以剖析。

也有从“新闻专业主义”为视角之一,对我国新媒体现状进行分析的。如齐爱军、洪浚浩的《西方有关主流媒体研究的多元理论视角论析》,指出“‘主流媒体’当下正成为我国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重要学术议题”,因此,论文“从新闻专业主义、媒介间议程设置、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多元公共领域等四个视角对西方有关主流媒体研究的相关理论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评析,并对我国的主流媒体论争作出自己的判断。”^③也有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对历史新闻现象的评述。如郭之恩的《资本家的伪善:为普利策兴办新闻教育辩》,针对普利策出资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动机众说纷纭的现实,该论文“以撰写于1902年、发表于1904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一文为蓝本,分析普利策新闻思想。与传统从新闻教育思想解读该文的思路不同,本文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的角度,以《新闻学院》一文为主线,综合普利策传记中的‘只言片语’,解析普利策对新闻业从一个职业发展为令人尊敬的职业的设置。”^④

在新闻专业主义问题的讨论上,观点比较新颖、视角独特的研究是陈先红、刘晓程的《专业主义的同构:生态学视野下新闻与公关的职业关系分析》,“提出当前新闻与公关职业关系的‘囚徒困境’问题,分析了媒体——消息来源和职业社会学两个研究路径下新闻与公关的职业关系及认知现状研究。论文通过引入生态学的理论范式,论证了新闻与公关职业特性认知和职业生态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认为在生态学范式下,职业共生关系是新闻与公关走出‘囚徒困境’的最理想选择,而‘专业主义同构’是这种共生关系下最理想的状态。”^⑤

3. 新媒体下新闻理论研究

新媒体下新闻理论的研究是指新闻传播载体变化后新闻理论所要面临的新问题:

第一,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报道。如何平华的《网络事件的报道与新闻价值的取舍》,指出“网络事件,尤其是隐藏商业营销目的的事件,普遍呈高伪装性、高开放性和识别的滞后性

① 吴世文:《争议性事件中的公众书写与新闻专业主义实践——以“邓玉娇事件”为例的考察》,《当代传播》,2013年第3期。

② 董天策:《专业操守与理性精神不可或缺——从“习总打的”假新闻谈起》,《新闻界》,2013年第16期。

③ 齐爱军、洪浚浩:《西方有关主流媒体研究的多元理论视角论析》,《新闻大学》,2013年第2期。

④ 郭之恩:《资本家的伪善:为普利策兴办新闻教育辩》,《现代传播》,2013年第6期。

⑤ 陈先红、刘晓程:《专业主义的同构:生态学视野下新闻与公关的职业关系分析》,《新闻大学》,2013年第2期。

特征。因此,网络事件的报道首要原则是要看其所蕴含的新闻价值,新闻价值的高低决定其价值的大小;报道技巧的运用则可视作对网络事件可能蕴藏的商业要素予以过滤的第二道屏障,而客观真实原则则是所有报道的起点和基础。”^①再如《创新与新闻业的未来》,指出“新闻业与媒体处于混乱的变革之中”,“在数字时代,新闻媒体能够成功的关键是创新。为了长久的发展,新闻媒体的创新应该遵循以下四项原则:决策基于资讯或研究,捍卫言论自由,致力于寻求真相与报道的准确性,以及遵从伦理道德。”^②也有对新媒体语境下新闻报道特征的分析,如王冬冬、张亚婷的《媒介融合环境下的电视新闻语态共生状态分析》,指出“技术进步引发的生产力提升不仅触发了传播链条结构的变化,而且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传者和受者的关系,这直接导致了新闻语态的变迁。媒介融合时代,多元N级传播结构成为传播过程的主要形式,呈现式联播新闻语态、呈现式民生新闻语态和融入式民生新闻语态共生于传播过程中。传者和受者的身份越来越模糊,新闻本文呈现出视点多角度、时序多层次、报道多点次的全息化、融入式的特征。”为新闻实务提供了理论基础^③。也有对新闻叙事策略的分析。如周庆祥的《如何融合:数字多媒体新闻叙事策略分析——以台湾媒体融合实践为基础的讨论》,“以媒体融合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台湾媒体网站如何进行多媒体新闻叙事的访谈调查展开,”研究发现“图像化多媒体新闻是竞争与获利关键,区块化是数字多媒体新闻布局基础,新闻网站必须强化社群媒体工具和用户回馈,主管与员工的数字元融合能力需要再教育。”^④也有对新媒体下新闻报道与传统报道相同性的研究。如白红义的《冲击与吸纳: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常规》,分析了新闻常规和网络新闻常规,指出“互联网对传统的新闻常规构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最终都被新闻常规所吸纳,没有从根本上颠覆原有的常规。”^⑤这对传统新闻想网络新闻转型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新媒体语境下舆情分析与引导。吴玉辉、谢新洲的《互联网等新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一文,指出“互联网等新媒体在我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对互联网的社会舆论影响进行了解读,并从互联网社会舆论的新态势、互联网对社会舆论的重塑以及互联网构筑社会舆论的新格局等三个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⑥。又如张红菊的《浅析互联网时代政府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指出“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给我国信息传播格局带来了深刻变化,对政府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带来了挑战。”本文分析了政府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工作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对政府如何做好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坚决落实和保障民众知情权;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针对舆论热点有效发布信息;搭建综合性信息发布平台,保障信息公开透明^⑦。也有研究地区舆情的

① 何平华:《网络事件的报道与新闻价值的取舍》,《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12期。

② (美)约翰·帕夫利克,张建中、李雪译:《创新与新闻业的未来》,《新闻记者》,2013年第11期。

③ 王冬冬、张亚婷:《媒介融合环境下的电视新闻语态共生状态分析》,《现代传播》,2013年第6期。

④ 周庆祥:《如何融合:数字多媒体新闻叙事策略分析——以台湾媒体融合实践为基础的讨论》,《新闻记者》,2013年第10期。

⑤ 白红义:《冲击与吸纳: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常规》,《现代传播》,2013年第8期。

⑥ 吴玉辉、谢新洲:《互联网等新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当代传播》,2013年第3期。

⑦ 张红菊:《浅析互联网时代政府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当代传播》,2013年第3期。

成果,如彭湘蓉的《新媒体环境下高校舆情演变规律——基于对西安七所高校的调查分析》,在对西安交通大学、长安大学等7所高校学生有关网络舆情认知、态度、行为变化的调查基础上,“分析新媒体环境下高校舆情的演变机理,探索舆情孕育的源头、舆情扩散的路径、舆情衰减的动因,形成对舆情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可为高校管理部门对网络舆情的预测、认知、引导、调控提供一些参考依据。”^①为研究舆情演变规律提供了范本。也有对舆情引导力的研究,如邓海荣的《新闻媒介舆论引导力提升的主要因素及对策》,指出“新闻媒介舆论引导力的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中,人才素质、媒介品质、机制活力、方法创新和媒介生态是影响其舆论引导力提升的五大主要因素。本文基于这五大影响要素,重点探寻了大力提升新闻媒介舆论引导力的方法与举措。”^②

第三,建构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理论体系。有对“数据新闻”理念的解釋与尝试,如方洁、颜冬的《全球视野下的“数据新闻”:理念与实践》,指出“是当下全球新闻业应对大数据时代发展变革中产生的新兴领域,且被视为未来新闻业的发展趋势。”因此,此文通过对国内外关于数据新闻的阐释文献的梳理,结合主流媒体实践数据新闻的经典案例剖析,“解读‘数据新闻’的概念内涵与基本特征,理清数据新闻与精确新闻、计算机辅助新闻报道、数据可视化之间的关系,展示数据新闻实践的最新成果。”^③也有从“公民新闻”角度探索新媒体下新闻理论的建设问题。如田园的《公民新闻对新闻生态的影响》一文,“立足于新媒体背景下错综复杂的媒介环境,将视角对准可能影响和决定媒体命运的微观新闻生态问题,以公民新闻这一新兴的新闻样态为切入点,探讨了其对新闻生态的影响。本文从对新闻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具有决定意义的四个方面——新闻的收集和生产方式、新闻内容的表现和表达方式、新闻的传播和流通方式、新闻传受者的角色定位和相互关系入手,分析了公民新闻对新闻生态的影响,包括:新闻信源大众化和生产方式融合化,新闻内容松散化和表达形式碎片化,新闻传播互动化和流通过程多向化,传受关系平等化和传受角色异变化。”^④

4. 新闻基本理念研究

2013 年新闻理念研究既包括新闻概念,也包括新闻内涵与外延的研究。一方面是对主流媒体(电视、报刊等)新闻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研究,一方面是对新媒体环境下新闻内涵与外延的研究,主流媒体新闻概念内涵与外延研究。包括新闻基本概念研究和新闻发展现状及特点研究。

新闻基本概念研究。对新闻基本概念的研究不多,但表现出追溯本源的历史性。如邵天松的《也说“新闻”一词首先出现的时间及词源》,指出“‘新闻’作为一个非词语的语言结构最早出现在西晋,后来进一步演变成一个动词性的短语结构,表示新近听闻之义。最晚在唐代,‘新闻’从一个动词短语演变成一个名词短语,表示新近听闻的事情。宋代以后,‘新闻’

① 彭湘蓉:《新媒体环境下高校舆情演变规律——基于对西安七所高校的调查分析》,《当代传播》,2013 年第 5 期。

② 邓海荣:《新闻媒介舆论引导力提升的主要因素及对策》,《当代传播》,2013 年第 3 期。

③ 方洁、颜冬:《全球视野下的“数据新闻”:理念与实践》,《国际新闻界》,2013 年第 6 期。

④ 田园:《公民新闻对新闻生态的影响》,《当代传播》,2013 年第 6 期。

基本凝固成一个名词。进入 19 世纪以后,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西方人用汉语固有的‘新闻’来翻译具有西方新闻概念的 news 一词,使得‘新闻’在固有词义的基础上初步发展出具有现代新闻内涵的新义。这一词语后来传入日本,被日语词所借用。随着中日词语的交流,‘新闻’的这一新义便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成为了一个表示‘报社、电台等媒体报道的消息’的现代专业名词。”^①也有对当下新闻发展特性的研究,如吕鹏的《新闻消费主义:概念界定、历史脉络与电视新闻生产表现》,“新闻消费主义是以市场为指向的新闻生产理念,它关注的是受市场影响的新闻生产与运作的一系列理念。新闻消费主义是伴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以及媒介新闻生产观念的变化而逐渐形成的。作用于电视的新闻消费主义使电视新闻的生产呈现五个方面的表现:① 新闻产品商品化,电视观众消费者化;② 硬新闻软化,软新闻娱乐化;③ 新闻追求原生态化,生活方式新闻化;④ 新闻叙事琐碎化,观看目的欲望化;⑤ 新闻生产本土化,新闻视角地方化。”^②

新闻发展现状及特点研究。如李良荣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转向及前沿问题》一文,对我国“新闻学界、业界研究课题的特点和一些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主要从 3 个方面来讲述了新闻传播学研究所面临的变化:① 从“小新闻”到“大传播”:时代变迁与新闻学研究领域的变化;② “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网络舆论带来的挑战;③ 从“意见领袖”到“群体意见”:微信时代网络舆情新情况。并指出“没有生命力的不是报纸,而是报道模式”的论断^③。

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内涵与外延研究。这主要体现在新媒体繁荣发展对传统新闻媒体的冲击,以及由此引起的新闻理念变化。

新闻媒体语境下,公民都有发布新闻的权利与条件,因此“公民新闻”成为继 2012 年之后的热点词汇,新闻理论研究中关于“公民新闻”的话题有了新的研究动向。如杨保军的《极化与融合——民众新闻与专业新闻关系的观念论观察》,指出“新媒体特别是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使民众新闻与专业新闻的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因此,“本文在对既有观念整理总结的基础上,从观念论角度提出,‘极化’与‘融合’可能是民众新闻与专业新闻关系的基本走向。也就是说,或者职业新闻与民众新闻始终保持适当的距离甚或分离、分立,民众的保持本色,专业的更专业;或者两者产生互动融合。”^④又如林三芳的《公民新闻的发展现状研究——新媒体环境下公民新闻的力量与乱象》,指出“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改变了新闻的产制与传播模式,一种新的新闻模式——公民新闻应运而生。从商业体制到去资本化媒体的建构,公民新闻别具意义。从政治腐败、警察野蛮执法到地方事务与国际大事,公民新闻的力量不可小觑。但‘守门人’的缺失,公民新闻的公信力正面临考验,甚至影响着公民新闻的未来发展。”^⑤再如申金霞的《公民新闻的三种类型及其政治意义》,“从我国公民新闻报道内容

① 邵天松:《也说“新闻”一词首先出现的时间及词源》,《国际新闻界》,2013 年第 4 期。

② 吕鹏:《新闻消费主义:概念界定、历史脉络与电视新闻生产表现》,《新闻记者》,2013 年第 4 期。

③ 李良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转向及前沿问题》,《新闻记者》,2013 年第 10 期。

④ 杨保军:《极化与融合——民众新闻与专业新闻关系的观念论观察》,《新闻记者》,2013 年第 6 期。

⑤ 林三芳:《公民新闻的发展现状研究——新媒体环境下公民新闻的力量与乱象》,《新闻界》,2013 年第 23 期。

的独特创造及公民记者报道某则公民新闻的主要目的之视角,可将目前我国公民新闻作品区分为三大类:利益诉求类、探寻真相类、社会动员类。利益诉求类公民新闻是公民记者维护自身利益的议题式抗争活动,是抗争政治的反映;探寻真相类公民新闻是公民记者主动挖掘事件信息曝光事件真相的新闻,是对信息政治的吁求;社会动员类公民新闻是公民记者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参与相关社会活动的新闻,是责任政治的体现。”^①

有自媒体时代新闻理念变化的研究,如陈昌凤的《自主的媒体人与个人专营网站的崛起——网络时代传统新闻戒律正在被颠覆》,指出“大数据时代的传统媒体要如何适应技术的发展,而改变原有新闻报道的思维方式和叙事形式呢?美国传奇的‘数据神童’内特·斯弗(Nate Silver)用他个人的经历与成就回答了一切。网络时代传统新闻戒律正在被颠覆,未来传统媒体的转型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实例与猜想,传统的新闻理论正在面临挑战。”^②又如吴炜华的《移动新闻的电视实践与文化视野》,“从数字新闻史论的角度,探讨了移动新闻之于新闻研究和实践的意义,并对其与数字公民新闻实践互动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也列举了国际上移动新闻实践与电视传播相结合的案例,希望对中国本土的移动新闻实践、传播及喧嚣和理论语境有所贡献。”^③

有对新闻业发展未来的研究,如范·哈克、米歇尔、帕克斯、曼纽尔·卡斯特的《新闻业的未来:网络新闻》,指出“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变化,在这加速发展的变化中,新闻的生产、传播以及被使用的方式也都发生了变化。我们正在目睹新工具和新实践的出现,这些新现象创造了信息生产的新方式,重新定义了专业新闻在这一新信息系统中的地位。尽管很多人都怀有一种恐惧,认为新技术的发展对新闻业和新闻记者的职业生存有破坏性影响,但事实上我们认为目前的发展或许能为更好的新闻业和独立新闻记者的发展铺平道路‘这就是这篇文章的主题和关注这个主题的原因’数字时代的网络新闻对专业新闻的独立和质量并非威胁,而是将其从严格的公司控制中解放出来。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它提供了一个以独特方式超越他人的机会,对社会来说,社会既能从无止境的信息扩张中获益,又能在一个信息让人感到困惑的世界中,从对信息的有益解释中获益。”^④也有从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建构新闻专业性角度进行的探讨。如李艳红的《重塑专业还是远离专业?——从伦理和评价维度解析网络新闻业的职业模式》,“借助职业/专业社会学(sociology of profession)的相关概念,通过回顾和考察欧美英文学术界针对网络新闻业所做的经验研究,对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兴起的网络新闻业的职业模式做出解析。”“通过对专业的规范维度和评价维度的考察发现,以服务公众为主旨的专业伦理规范在新媒体环境下遭到挑战,被降低标准;专业的自主性受到来自商业的极大侵蚀,同时受到来自大众意见的干扰。结合上文对于网络新闻业

① 申金霞:《公民新闻的三种类型及其政治意义》,《当代传播》,2013年第1期。

② 陈昌凤:《自主的媒体人与个人专营网站的崛起——网络时代传统新闻戒律正在被颠覆》,《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9期。

③ 吴炜华:《移动新闻的电视实践与文化视野》,《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6期。

④ 范·哈克、米歇尔、帕克斯等:《新闻业的未来:网络新闻》,《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1期。